

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景

J. Gunther 著
洪流 譯

前言

這本小冊子包括着從去年那動亂着的夏天起，直到戰事發生這期間止，我從歐洲到美國的途中，由於國家廣播公司（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）的邀請，在沿途各城市所作的廣播演講。本來，我計劃着講演一個有連貫性的題目：「歐洲內幕再度探訪記」，希望能把我在巴黎，柏林，但澤，華沙，莫斯科，倫敦，以及其他各中立國家的首都所得的印象，連續地描摹出來。但事實的可怖開展，把我從半路上摔了出來。我的計劃，我的旅行，一切全給弄得不成個樣子。

這裏所刊印出來的，差不多全和我的原演講一樣，除掉改正一些文法上的失錯，和後邊一部分因為時效的關係，刪除一些材料以外。可是，雖還是它原來的樣子，但書本上究比我在空氣中所允許說話的時間長，因此，在講演時不得不削去或簡略的文字，現在却完全恢復了它的完整。我並沒改變我的意見，亦沒變更了我的預測，我希望我確是這樣。

當我寫着這段前言的時候，歐洲正在這從來未曾有過的災難裏掙扎着。波蘭（Poland），事實上已在三個星期裏給完全摧毀掉。德國第二步究將攻擊那裏，我們還都不能知道。也許，它獲得了蘇聯的助力，在東歐方面進行鞏固他們地位的工作。也許，他們將進攻羅馬尼亞（Rumania），用羅馬尼亞的油，羅馬尼亞的穀物，去安度這寒冬。另一方面，他們也可能向西進攻，穿過了荷蘭（Holland）和比利時（Belgium），抱了最大的野心，希圖像摧毀波蘭一樣，在協約國可能開始戰爭以前，就一舉擊敗英法，結束掉這次戰爭。

各處都有許多謎存在着。在東部發生了非常的事件，而西部却還保持着異樣的靜默。許多人都期望着這是由那些大城市的大規模毀壞開始，對於倫敦，柏林，巴黎來一個閃電式的空襲。但到了現在，這一切却還不見實現。當然，一方面是懼怕着對方的報復，另一方面却也不願意擔負首先轟炸平民的罪名。因為英法必須在西線保有充分的軍力——他們對於波蘭，因此連一些間接的助力也不可能有了。

最大的謎，還是那無從猜測的蘇聯。我們不知道究竟蘇聯是否會限制希特勒，不使他作更大的侵略；還是聯合他，一起去分割那一些土地。蘇聯和德國間也許到某一個時

候會起爭執；但也許他們還可能繼續合作下去。我的猜測是他們會繼續合作下去的。這因為蘇聯的幫同進一步去摧毀目前的歐洲機構，對於他的國家主義和國際主義（就是世界革命）都有利益。他們看着德國人玩着他們自己的工作——蘇聯的工作，進攻着西方的資本主義。亦就是，德國人可以幫助他，也許是無意的，替革命殺出一條路，無論在德國以內或是德國以外。

這戰爭裏，中立國定將占據着一個極重要的地位。我們差不多可以說，這戰爭裏最有趣的一件事，就是還沒參加進去的國家的數字。我們稱之爲這是「第二次世界大戰」那是太誇張了。只有五個歐洲的國家是在戰事中，雖然，日後自會有很多的加進去。目前，德國周圍的中立國，給予了他以極大的助力——不但是那些傳統上的中立國，像丹麥，荷蘭，瑞士他們，還更有那些上次大戰裏的敵國，像比利時，意大利，南斯拉夫，以及匈牙利。這一個中立環，使對於德國的完全封鎖十分困難，但在另一方面，英法對於有一些國家的中立——亦有着最好的利用。

我想，這一次戰爭，主要的還是德國和英國間對於歐洲盟主的爭鬥。兩種主要的武器，定將給抓住，那就是饑餓和宣傳。目前差不多已是封鎖的雙重戰。德國企圖使英國

饑餓——英國亦想使德國飢饉。但德國人的饑餓，不僅是白脫油——還更有着新聞。所以，我幻想，英國定將在封鎖原料和軍火之外，設法把新聞灌注到德國去，那就是所謂宣傳。協約國最好的希望就是德國內部發生裂痕，雖然那不知需要未來多少長的時間。

謝謝約翰·勞亦爾（John Royal）、弗萊特·倍脫（Fred Bate）、馬克·喬頓（Max Jordan）、保爾·亞訖那（Paul Archinard）國家廣播公司諸先生，他們幫助我完成了我的工作。

J. C.

倫敦。一九三九年九月廿一日。

一 準備中的法國

在巴黎。一九三九年七月九日晚。

各位聽衆：離開了歐洲三年，我又再度的回到了這裏。我正再度拜訪着巴黎以及其他各首都，想尋出究竟在歐洲的歐洲人們，究在想着些什麼。目前，歐洲真可以說是一個幽黯的大陸。這裏每一個人都有着兩個主要的問題。戰爭是否會發生？法國究將怎樣？今晚，讓我簡單的來概述一下，在這重要的關頭，法國的地位究竟是怎樣。

巴黎還是和以往一樣的美麗，輝煌，繁榮。街道給燈光染成了紅色，飯館也充滿着活氣和艷色。法國人，他們有着可驚的權衡力，天生的謹慎，以及和睦的個性，他們還同以往一樣的過着很好的生活。在表面上，巴黎並沒有什麼變動。巴黎還是那樣的城市，電梯充滿着乘客只往上跑，那些出差汽車夫全是些極端的個人主義者。但在這表面的燦爛——嫵媚和美麗後面，却不免有着一重灰暗的陰影，我上次訪問裏所從不能看見的。這就是戰事的不祥的暗影——懼怕着戰爭。

大前天我在到香潑—愛列散（Champs-Élysées）路上走着，我聽到了一種聲響，劃破了巴黎市的長空。起先我以為那也許是一輛出差汽車失了火。但過後那聲響還繼續着，我於是知道那是一種警報——空襲警報，每星期四中午發響，一星期一次。這聲響從諾脫·但姆（Notre Dame）傳到凱旋門（Arc de Triomphe），從那裏再回送過來。但對於這，並沒一個人給予絲毫的注意。昨天，我看到有一部分防毒面具在紐葉（Neuilly）散發着，但今天在警報裏，我却沒看到有一個人依照着規定在做。沒人在尋找着新的掩蔽所，那全都設置在不很顯著的地方。這種種引向我要解說一個問題，那就是這裏的一切，全都掩飾住了對戰爭的恐懼。法國人是現實主義者。他們並不像許多別的人們，並沒有很大的厭惡，對於那些顯明事情的認可；很簡單的，只因爲顯明的事情是往往太可怕了。法國人知道一個很嚴重的危機在滋長着。但是——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但是——他們却並不驚慌。他們也並不惶恐。我曾經聽到這樣說過，是一種好意的，略帶譏諷的法國式說法，那就是星期四發一次警報的真實理由——只是檢查一下這警報是否完好的工作狀態下而已。法國人是太漠然了——雖然每一個建築物裏，都有着巨大的新招貼，告訴人們當空襲時應該怎樣——使得那些過謁者實在有些迷亂。但法國人却

在他們自己特殊的方法下做着事情。最近，有一張漫畫上畫着兩個人在火山上跳着舞。「爲什麼不呢？」那畫上這樣寫着：「總之，火山是個很可以起坐的地方。」當他們說起戰爭時，大多數巴黎人都聳着肩，顯着漫不在乎的樣子。假使戰爭來的話，我們也已準備好了，這就是他們的回答。

自然啦，差不多任何談話裏，關於戰爭的話，總是佔着主要的地位。一個美國朋友今天早上告訴我，他曾向一個法國政治家說起，他預備把今夏的假期費在波羅的海的航行上。『乘什麼船？』那政治家問，『一隻俄國潛艇？』還有，當人們計劃着家庭的宴會或假期，他們同意出席，然後再說H. P. ——那意思就是「希特勒准許的」。

(Hitler Permitting)。昨天，我相信，消息傳來說希特勒已退到他那勃肯脫司茄頓(Berchtesgaden)的山上的小屋子休息，確實給予法國人一個很大的打擊，比上星期末但澤的危機所給予的打擊更大。每一次希特勒跑到勃肯脫司茄頓，我的法國朋友說，他就是到那兒去沈思一些東西；每當這個不易了解的人，這夢遊者，這小拿破崙開始沈思些什麼，沒有人能預知將會有什麼事情發生。但有一點我得再說明的，那就是法國人的態度並不是那樣不可控制的激動和驚恐。法國人是憂慮着，像每一個敏銳的人一般的

憂慮着，但他們却依舊還是冷靜的。這裏，無論如何你找不出絲毫驚恐的現象。

目前歐洲僅有的問題，就是德國問題。只有德國可能造成一個戰爭，但在法國，在鮑里伐·赫司門（Boulevard Hausmann）的廣播電台上討論這問題，却也很自然；那因為法國是歐洲民主制度的心臟，是纖美的歐洲文明的心臟。而且這戰事假使發生的話，最後這巨擊是要打向法國的。有一個時期，這種恆久的德國的威脅，使法國人很迷惑，很沒有決心。但現在，人們慢慢的同意克里門梭（Clemenceau）氏所提出的那句話：『假使你對德國讓步的話，戰爭將在二十年裏爆發；假使不讓步的話，那至少得四十年。』這意思就是，你還可以多得二十年的和平。

在過去的六個月裏，法國已有着很大的恢復。經過了一個分散和失敗論的時期後，法國人已回復了他們以往的精神。我曾請求我的朋友們告訴我，他們對於這一種新生有什麼感覺，並且描劃出它的性質。首先，在財政上有着一個很大的恢復。在過去幾個月的人民陣線下——那是有着很大的目標，但却並沒很好地實現出來。——至少有八百萬萬法郎逃出去。但現在，差不多這數字的一半，已跑了回來。換句話說，從這最敏感的一點，他們的皮夾方面說，法國人對於法國本身已再沒有什麼恐懼。

其次，在政治上有着很顯著的團結。希特勒做了一種自相矛盾的工作。他完成了他所想要防止的事——法國政治上的團結。內閣總理達拉第氏，他雖不是一個獨裁者，却有着絕對的權力。他可以在辦公室裏安坐到十一月。從極右派到左翼的緩和派，差不多每一個人都支持着他。

第三，軍事上的地位亦已有了很大的改進。法國軍隊也許還是歐洲最優良的軍隊。他雖缺乏某一些配備，尤其是某種式樣的大砲；還有飛機的生產量，也還覺得不夠，可是軍用飛機的生產，目前已從每月七十架增加到每月三百架。軍隊的士氣也很激昂。亞爾賓·却沙（Alpine Chasseurs）的一個支隊，全體官員和士兵，三十個鐘點裏步行了五十二哩，就是一個很好的紀錄。馬奇諾線裏充滿着人員。法國人並不要戰爭——他們決不會造成一個戰爭，因為戰爭對他不會有絲毫的利益——但當戰爭到來時，他們却定會抵抗。

戰爭需要金錢，所以人們懼怕着戰爭。目前的危機，亦就所以需要大規模的軍事準備。我覺得很震動，當我發覺法國本來六百萬萬法郎的預算，倒有一半是化在防禦上。此外，還有三百萬萬的額外預算，也全用在防禦工作上。所以法國爲着懼怕戰爭，目前

正費着——亦可以說是被迫而費着，國家全部稅收的三分之二在準備戰爭上。這是一種很可怖的現象。任何人都要覺到驚奇，而且要奇怪這究能維持到多久。感謝歷史上那些痛苦的時代——加上帝國의貪婪——還加上希特勒先生。

剛才我曾提起過內閣總理達拉第氏。在過去幾天裏，我會到了許多法國的政治家，而昨天，我亦曾和達拉第氏有過一次談話。他除了是內閣總理外，更是國防部長。我在他國防部的辦公室裏見到他。他坐在克里門梭的老屋子裏——並不是一個無聊的並列。這裏，讓我試着刻劃出達拉第的影像；這人，法國的命運，以及其他很多別的東西，都依賴着。

他是個五十五歲左右的矮個子，相當肥胖，廣大的額，闊厚的肩，而且有着一雙極敏銳的綠眼珠。他很幽默；說話很流利，而且很堅定；他是一個重實際的人，對於理論很厭惡；他給人們一個很頑強，亦很尖銳的印象。達拉第的出身是一個農人。他的父親是個麪包師。他是法國極南部的伏克洛 (Vaucluse) 地方人；他個性和脾氣都和巴黎人不同，他不喜歡社交，他亦不喜歡奢華。像許多美國的政治家一樣，他是自己努力出來的人。他奮鬥着穿過了學校的階段，過後又成了一個教員。在一九一九年時，他才踏

進政治，而且還有一個時期，是歷史學的教授。他的特長就是中世間的歷史。從一九三三年以來，他常是國防部長——目前，他已是第三度擔任內閣總理了。

達拉第取得權力的淵源很多。他的農人出身就是一個因素。這意思就是說，他是一個堅韌，愛護土地而簡約的人。還有，和其他的農人們一樣，他是一個常抱着懷疑態度的人，正像法國的俗語說，把白硬領扣鎖到頸下一樣。他很少接見別人，就是他自己的屬員有時候也很難找到他，而且他還厭恨那些不需要的談話。另一個內閣總理海列脫氏（Herriot），在一年裏共作了六十次公開演講，而達拉第在同一時期裏，却僅僅作了三次。再，因為是一個農人，他是一個個人主義者，亦是一個民主主義者。他相信財產制，他相信他所有的一切，他還要保有着它。

另一個達拉第權力的來源，不用說的，是他和軍隊的緊密的連繫。此外，他是法國最大多數黨——急進社會黨的首領。（其實，法國的術語上雖叫他急進社會黨，而實際上，既不急進，亦不社會主義化。）然而，達拉第亦屬人民陣線，曾統治法國有二年之久的最左翼的聯盟的首先的幾個領袖之一。實際上，成爲一個急進社會主義者，意思只是說成爲一個平常的法國人。達拉第就是這一種人。他不僅代表着中等階級的人們，

他自己亦是其中的一個。昨天我曾問那些和他最接近的人們，達拉第最信仰些什麼——就是他的基本信仰是什麼。那回答是：達拉第只相信三件東西：法國，中等階級的法國人，還有他自己。

過去幾天，我曾問每一個我所見到的人這一個連帶的問題：戰事能避免嗎？和平有希望嗎？答語差不多全都是這樣：和平是也許可以挽救的，假使希特勒能聽從別人的勸告：這次戰爭裏他不可能獲勝。這意思就是使希特勒相信：和他敵對着的力量，要比他強。法國人並不喜歡希特勒。但他們亦並不想希特勒是一個愚蠢的人。從每一個合理的基點去觀察，希特勒應該知道即使他起初的投機是勝利了，但終極他一定要失敗，無論他自己或是他的政權，一定不能逃避這一個失敗。所以，許多法國人都這樣說，假使民主國家能真的建立起一個強而堅決的陣線，並且表示他們堅決的決心，那希特勒，除非他自己要自殺，決不會發動戰爭。

法國人看到兩種危險：一個就是希特勒誤聽別人的報告，意思就是他不能真實的認識英法兩國的實力。我曾聽到人說過，里賓特洛甫氏（Herr Von Ribbentrop），希特勒的外交部長，是目前歐洲最危險的人物——因為希特勒大部分的情報都從他那兒得

來，而到目前爲止，他恐怕還繼續着在告訴希特勒說，無論發生什麼事情，英國決不會加入戰爭。也許里賓特洛甫是對的，但法國人却並不這樣想。他們深深的懼怕希特勒幹下一個可怕的失誤，以爲他可以取得但澤，決不會引發什麼戰爭，以爲英法決不會打。可是法國人却說他們會打，而英國人亦正是一樣。

法國人面前第二個危險，就是對蘇聯談判的完全失敗。這談判，目前已成了一個僵局。現在所剩的時間已不多，但我還希望我能把這一個僵局的零碎故事告訴各位。蘇聯當然對他所給予的助力需要一個很高的代價，這代價就是波羅的海各國一個完全的保證，不獨是對外來的，還更包括着內部的侵略。這意思就是說：假使芬蘭，愛沙尼亞，拉脫維亞等國家裏發生了一些什麼他們所不喜歡的事情，蘇聯就要來設法加以保護。但波羅的海各國不要這一種保證，而英法亦很難讓他這樣做。可是法國人很知道，假使戰爭來臨的時候，沒有蘇聯在東方臂助，將是一件很嚴重的事。他們還更知道，假使和蘇聯的談判失敗的話，那在英國將要激起這一種言論，就是願用任何代價去滿足希特勒。總之，但澤在這當兒是個最危險的所在。法國人想，在今年夏季的時候，但澤最大的危機定將來臨。情形大概是這樣：德國當然不會進攻但澤，但他却將在內部造成一個

和平的叛變。這樣一來，波蘭將擔負首先發動戰爭的責任。波蘭人堅持着，假使有叛變發生時，他們定將抗爭；而英法亦因為條約上的義務，必得去支持波蘭。也許希特勒將使那叛變漸漸的發生，假使這是可能的話，那波蘭將永不可能確定他的戰鬥與否的地位了。

把眼光離開但澤，把眼光儘可能的放大到整個的時局，許多法國人都這樣想，永久和平的代價，將是德國的獨霸歐洲。這放在他們前面一個很可怕的選擇，他們還是用一再的讓步去購得希特勒的和平呢？還是發動戰爭去制止他？兩者都是一種重大的打擊，都是人類的可怕的損失——而那些文化發展很高的法國人，向來對於人類的價值有着很高的估價。究竟是犧牲一百萬青年男子的生命在這戰事裏，孩子和婦女們不計算在裏面；還是把歐洲的大部份向他投降，以遲緩它的死亡，法蘭西主義的死亡。

此外，有一個第三的可能辦法，至少到現在還依舊是可能的，那就是使時局可能的和現在一樣的僵持下去。根據事實想，希特勒應該知道——假使他有理智的話——戰爭將毀滅他自己。再根據事實想，法國的團結，英國的擴軍，假使戰爭發生時加上一個蘇聯的聯盟，那將對他終極的廣大的掠奪，有一個很大的限制。事實上，希特勒早已占有

了但澤。沒有一個德國人在那裏受着不當的待遇。他不能像他佔領蘇台德（Sudetenland）區那時一樣地說，那兒德國的少數民族受到了壓迫。法國人希望希特勒能相信他現在所有的已感滿足。預測現在自很困難，更不要去說起危險。差不多每一個人都這樣想，就是在今夏定將遭遇一個極大的危機；但他們也還更過分的希望着，就是這危機能不用戰爭去克服它。不過，與其退步過多的話，法國人還毋寧是起來鬥爭的好。

二，德國透視

在日內瓦。一九三九年七月廿三日晚。

各位聽衆：今晚我是在瑞士說話，但我却要談起德國，並不是瑞士。我在德國勾留了幾天後，才到達這裏。在那裏，我大部分時間都費在萊因區（Rhineland），沿着齊格斐防線，和靠近法國邊界的最大的工業區。二星期以前，我在巴黎給你們講過一次話——試着想把法國的情形告訴你們——把法國人在這危機四伏的時期裏的動態告訴你們。今晚我要把德國也這樣的來談一下，讓我這三年後再度訪問德國所得的印象，告訴給你們。

我並不是一個喜歡說驚人話的人，而且，事實上，我也是我的同僚中對於戰爭的憂慮最少的一個人；可是我却不得不這樣說，一走近德國，你就會立即清楚的覺得，那兒確是一個絕對非常的時期。譬如說，這次我坐的那輛花車，我就是一個僅有的乘客。就是這整列火車，一列很大的國際快車，總共也不滿一打人。戰爭的恐怖，使每個人都跑